

阿 拉 善 盟 文 史

第 一 辑

阿拉善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资料室

出 版 说 明

《阿拉善盟文史》是我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办的不定期内部资料集，所选用的稿件，是我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民族宗教、社会生活等诸方面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其它有关的历史资料。我们编辑出版《文史》的目的，在于存真求实地记录阿拉善盟历史，供史学界、文教界和社会各有关方面参考，并推动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和文史资料工作，为“四化”建设服务。

本辑选用的稿件，多数是盟、旗政协委员，各界爱国人士撰写的回忆性“三亲”材料，也有资料、档案、传说和经过多方采访认真调查研究撰写的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资料。由于撰稿者的经历所限，都不免有一定的局限性，内容也可能有出入，观点可能不完全正确，加之这是我们的初次尝试，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请各方面读者、知情者予以补充、订正，共同把《阿拉善盟文史》办好。

在此，我们向为《文史》热心撰稿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希望继续撰稿。

凡在《文史》发表的文稿，未经本会同意，不得转载。

编 者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于巴彦浩特

阿拉善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成 员 名 单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日政协阿拉善盟
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主任委员：段塔拉腾岱

副主任委员：阿兴阿、范额尔德木巴图

委 员：黄孟和、乌力吉、赛伯英、戚涛、德淑珍、
散丹、律宗宪、赛音别力格、乌达布拉

编 辑 部

文史办公室工作人员名单

副主任：阿拉腾敖其尔

主 编：朝格图

编 辑：敖特根

目 录

阿拉善旗和平解放及其前后的历史状况

-范额尔德木巴图 罗阿日斯楞(1)
- 额济纳旗的和平解放及前后历史概述..... 张宏林(37)
- 追忆塔旺嘉布先生..... 藏登米德格(61)
- 梁、胡嫌疑案真相..... 戚涛(73)
- 阿拉善、额济纳旗历史由来..... 朝格图 白晓(84)
- 古居延与额济纳土尔扈特之来历..... 巴达尔胡(98)
- 高世格梅林及其《普济杂方》..... 段贡布甲布(102)
- 范氏十一代行医史简略..... 范诺尔布扎木苏(105)
- 与卫拉特历史有关的几个片断..... 贡其格(111)
- 阿拉善盟畜牧业发展概述..... 洋金都(118)

补
白
文

阿拉善旗各防卡名称(83)理藩院(97)
绿营(101)八旗(117)

征稿启事..... (122)

阿拉善旗和平解放 及其前后的历史状况

范额尔德木巴图

罗阿日新楞

1686年前，阿拉善的一部分牧地属清朝皇帝的军马场，定远营①原址为皇上的“御马圈”。1686年（康熙25年），清朝廷恩准和罗理部暂居阿拉善，1690年（康熙29年），清朝廷正式将阿拉善地界赐予和罗理。1697年（康熙36年），清朝廷册封和罗理为固善贝勒爵位，并赐扎萨克职，遂设阿拉善霍硕特旗。自建旗至1949年解放的252年间，袭位计九世十王。

一、阿拉善旗和平解放前的基本状况

1、军政机构

阿拉善旗（以下简称阿旗）面积约十九万平方公里，1949年除磴口县外，三十六个巴格的人口约三万多，大小牲畜三十四万多头（只）。

阿旗政府设置的行政机构有办公室、政务处、秘书处、教育处、财政处、理事官厅（法院）和稽查局等。旗政府所属大小官吏共245名（巴格达木尔、防卡长、职员不计其内）。

旗政府军事机构有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和阿拉善旗骑兵保安总队。

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下设办公室、政工处、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和军医处等，任有司令、参谋长、主任、处长、副处长、军医官、专门职员等若干人。

阿拉善旗骑兵保安总队，有总队长一人，副总队长二人，其中一人兼参谋长职。总队下设五个中队，每个中队有中队长、副中队长各一人。中队下设有四个分队，每个分队约有官兵42人，有分队长一人，副分队长一人（副职不属军官之列）。此外，还设有直属勤务分队和通讯分队。这两个分队，也有正、副分队长各一人，常外出执行临时性任务。全总队共有军官150余人，兵员达1270人。

行政管辖。全旗设八个苏木、三十六个巴格、四十六个防卡。八个苏木又分为左、右两翼各四个苏木。苏木是介于旗府和巴格之间的一个行政机构，它任有佐领、骁骑校职的官员各一名，但无专门的办公地点。佐领、骁骑校是旗政府的一级重要官吏，平时虽与旗府其他处、室一起办公，但他们只是管理涉及苏木的有关户籍、征收宝得及征兵等事项。巴格是管理军政等诸事务的最下层的行政机构。每个巴格有若干不脱离生产、不领薪金的达木尔（边官）。阿哈木德达木尔是主管巴格事务的正职，二达木尔属副职，其余达木尔为一般办事员。巴格也无固定的办公地点。巴格的印信由正达木尔随身携带，当有公务要办理时，先由正职达木尔发出通知，有关办事人员接到通知后，就赴约定地点，几个人坐在一起商讨公务，分派差事。全旗属这类达木尔职的约有260人。

全旗设有防卡四十六处（包括临时性防卡），其主要任务是，防守本旗地界，维持地方治安，征收草头税等。防卡一般有正、副两名卡长，也有只有一名卡长的。全旗共有九十余名卡长。其中，有的卡长是由达木尔等小官吏兼职。防卡兵约有四百名。

寺院是宗教方面的组织实体。寺院首领大喇嘛、德木其、格

斯贵，俗称皇上的三个喇嘛。寺院的大喇嘛由旗府指派，旗府可对寺院直接行文征赋或征喇嘛兵。全旗共有大小寺院、浮屠（塔）等三十余座，喇嘛近4000人。

2、商业

早先，在全阿旗范围内约有大小商号、店铺一百五十余家，解放时，设于定远营的有四十来家，客店十多家。这里的商号，主要是由北京、山西、包头、银川、民勤等地的商贩所经营。其中最大的一家商号是由私人合股经营的“祥泰隆”。这些外地商贩设店经营，或交通不便的广阔沙漠地区来回行商及时送货上门，主要经销各种金银首饰、铜碗器具、绸缎、布匹、粮食、糖果、烟酒、砖茶等日用杂货。同时又向牧民收购牲畜、皮毛及土特产。商贩的上述商业活动，对当时阿旗牧区的生产和生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在定远营市场上，布匹、地毯、砖茶、烟酒、糖果、米、面及枣、核桃、柿饼等干鲜水果应有尽有。邻近蒙旗和外蒙古（三十年代以前有来往）也常来人用牲畜、皮毛交换日用品。因阿拉善的双峰驼以绒、肉、畜力兼优而远近闻名，故包头、银川、兰州、武威、张掖等地也常来人收购。当时的定远营城生意兴隆，热闹非凡，以塞外的“小北京”扬名在外。

3、天然资源

阿拉善是一个有丰富天然资源的旗。这里的矿藏资源有：盐、煤、碱、金、锡、水晶石、石棉等。其中，吉兰泰、雅布赖、查汉池、和屯敖包等四大盐湖和古拉本、乌达、胡鲁斯太、上井子的四个煤田均以其丰富的蕴藏量出名。

野生资源有：木材（贺兰山松）、苁蓉、锁阳、甘草、发菜及各种药材等；还有贺兰山的鹿、獐子以及羚羊、猞猁、豹、狼、豺、黄羊、青羊、盘羊、野驴、野驼、狐、獾、旱獭、兔、

黄鼠狼、艾虎（艾鼬）等。

自1941年（辛巳年）大旱至解放，阿旗再未遇大旱，水草渐丰美。再则，1938年至1949年，阿旗也未遭受大的战乱的祸害。然而，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马鸿逵的蹂躏及封建官府苛捐杂税的盘剥下，物价极不稳定，畜产品价格被压得很低，加之狼患成灾，瘟疫流行，人民的处境十分困难。社会各种矛盾日益尖锐，政治局势动荡不安。

4、解放前夕的社会状况

1949年春，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外地的不速之客频繁进出定远营。很显然，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了。对此，人们感到疑惑和不安。就在当时，美国军事顾问也来阿旗活动。他们表面上装出援助中国的样子，向达理札雅问这问那，弄得达理札雅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国民党国防部要员来阿旗鼓吹什么“要凭借贺兰山的天险与共军决战”，并责令阿拉善旗必须予以大力支持。此外，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及其同伙也从广州、北京、兰州、东北、宁夏等地纷纷来定远营，咒骂共产党，兜售所谓的“蒙古自治”。这些政客千方百计地拉拢达理札雅，一个劲地吹嘘要在阿拉善干一番“蒙古自治”的大事业。1949年春，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来电要达理札雅前去。达理札雅接电后，于农历二月末与郑札范、罗扎木苏一同到达兰州。此时，德王亲自拜会达理札雅，向他提出了有关在阿拉善实行“蒙古自治”的问题。当时，达理札雅未作答复就搪塞过去了。过后，达理札雅探听了张治中的口气。张对他说：“现在，谁想干什么，全由他自己作主去，德王想在阿拉善搞‘蒙古自治’，就由他搞去好了，你不用管他。”达理札雅听了此言，对于德王的主张，也就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了。

嗣后，德王赴广州从国民党政府要回经费一万银元，遂于当

年八月在阿旗正式成立了“蒙古自治政府”。这样，阿旗局势愈加趋于复杂。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罗相丞）等，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考验和抉择。要么拥护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走起义投诚之路；要么死心塌地追随国民党反动派，走与人民为敌的绝路。二者必居其一。

二、阿拉善旗和平解放始末

在1949年决定阿旗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以达理札雅为首的旗政主要人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和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推动下，在傅作义将军和平起义之举的启发教育下，顺乎潮流，深明大义，毅然于九月廿三日率部起义，结束了阿旗二百多年封建统治的历史，揭开了阿旗历史新的一页。

阿旗札萨克达理札雅等人，举行和平起义是有其政治、历史的原因和深刻的思想根源的。要弄清这个问题，就得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和研讨。

1948年底，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业已取得决战胜利，蒋家王朝的覆灭已指日可待。1949年1月31日，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影响和感召下，国民党著名将领傅作义率部起义，北平得到和平解放。傅作义将军的这一弃暗投明的义举，震惊中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时，国民党当局惊恐万状，为取得喘息的机会，以便扩军备战，遂装出“和谈”的姿态，委派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为首席谈判代表，在北平与我党进行和平谈判。在谈判中，因蒋介石拒不接受我方的条件，谈判于1949年4月20日宣告破裂。张治中先生当即脱离国民党政府，留在北平再未回去。4月21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紧接着，我百万雄师以排山

倒海之势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直捣南京。在这种情况下，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等能够正确估量形势。他们认识到，只有走傅作义将军的道路，才能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他们的这种抉择，是由于形势所迫，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除此之外，还应该看到，以下几方面的历史原因是促使达理札雅等发动和平起义的内在因素。

1、1938年2月24日（农历正月25日）夜间，宁夏的马鸿逵出兵攻打定远营后，将达理札雅胁迫押往银川，后送兰州软禁达七年之久。马鸿逵为何这样做，有关这方面情况，值得一提。

1926年，冯玉祥将军赴苏联考察回来后，于9月17日在五原举行誓师大会，率部起义。当时，马鸿逵也前去参加誓师大会，被任命为国民联军四路军军长职。不久，他于1929年（民国18年，己巳年）追随韩福渠，石友山弃冯（玉祥）投蒋（介石）。马鸿逵因倒戈有功，被蒋介石任命为十五路军总指挥。

1932年，马鸿逵出任宁夏省主席后，玩弄两面手法，将其黑爪伸向了阿旗。

在1935年间，日本特务机关窜到我西北地区活动。他们来到定远营后，就在“祥泰隆”内设立了活动据点。马鸿逵得知日本人来定远营的消息后，立即密派其姓蒋的参谋前往定远营与日特暗中勾结。当那个蒋参谋返宁时，日特机关提出：“有要事与马鸿逵主席面商”。蒋参谋表示，回去就转告马主席。当时，日特见蒋参谋有为难之色，就威胁说：“在这个问题上，要是马主席犹豫不决，那我们就认为他对大日本帝国不恭。”蒋参谋返宁后就向马鸿逵秉报了定远营之行的情况。听了秉报后，马鸿逵认为，日军有朝一日可能攻进宁夏境内。因此，现与日本人拉上关系的话，日后对己有利。他权衡利弊，拿定主意后，就派专车将日特接回银川，秘密安排在中山公园的公子阁内。他与日特握手言欢，大献殷勤。日特对马鸿逵的态度十分注意，遂提出要与他合

影留念。马鸿逵作贼心虚，害怕被人抓住其勾结日特的证据，不肯合影。可是，他与日特干杯言欢的场面，早已被日特方面秘密拍摄。马鸿逵发觉日特已密拍，着急万分，再三央求日特：“你们提出什么要求，我都尽力而为，但千万不要把我们的照片公布出去了。”日特见目的已达到，表示可以不登。过后，马鸿逵就将日特送回定远营。此事很快被人发觉，不久就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蒋介石有心保马鸿逵，就电令马鸿逵严加查办暗通日特分子。接电后，马鸿逵吓破了胆，正当束手无策急得团团转时，其四姨太凑过来说道：“你当了一省之主还不知其中的奥妙吗？老蒋明知你的事，却又给你来电，这不是明摆着让你找个替死鬼，开脱你自己吗？”马鸿逵听了四姨太的这番高招，才茅塞顿开，恍然大悟。随即将接送日特的司机以通日特的罪名加以逮捕，又将其秘密处死。然后，将所谓查办情况报告蒋介石了事。就这样，马鸿逵施嫁祸于人诡计，既保自己无事，又堵住了他人的嘴。这还不够，他又向国民党当局密告说，日特就居住在定远营城内，阿旗的当政者也十分可疑等等。就在这时，达理札雅向当局如实报告了日特在定远营的活动情况，并询问当局准备采取何种措施。鉴于此，国民党当局下令陆军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副师长杜韦明等，率部前往阿旗驱逐日特机关。关、杜二人接令后，率两个团（该师的大部兵力留在宁夏中宁县）进驻定远营，将盘踞在“祥泰隆”的日特全部召集在一起，限他们两小时内撤离定远营。那些日特见此状况，就慌慌张张地乘飞机逃走了。

日本人走后，关麟征师长不但没有指责达理札雅，还安抚说：“日本人又不是你们请来的，用不着害怕。日本人不只是来你们阿拉善，东北和西北的一些地方也有日本人”，

关麟征在定远营呆的时间虽不长，但作了不少事情。首先是破坏了日本人的简易机场。他还召集大、小会议，对阿旗的防务提出极好的建议。他强调指出，要想抗击外寇，必须首先拥有自

己的武装力量。为加强阿旗的防务，他拨给了500支步枪、50000发子弹，同时还强调和赞助了阿旗的军事训练及文武人才的培养。1937年（民国26年）阿旗旗府举办了首届军事技术特别训练班，挑选四十余人受训。另外，还集训了旗保安大队的一百余名士兵。这次训练班的总教官由陈匡担任，教官有叶庄之、李子源二人。当时，旗协理罗恩克巴图、副协理罗巴图孟柯二人也参加了正式训练。从那以后，达理札雅等非常重视关麟征的建议，多次派青年人赴外地受训。1940年，阿旗首次二十余名青年到国民党黄埔军校七分校受训。八年抗战期间，曾先后选送到南京、重庆、兰州、银川、平罗等地学习的达七十余人，其中有的还大学毕业。以上这些，就是自关麟征从阿旗驱逐日本人以来，达理札雅等为赶上时代潮流而着手开办的一些具体事项。

由于从阿旗驱逐日本人的军事行动中，国民党当局未动用宁夏的马家军（杂牌军），而是将其正规军的第二十五师调进宁夏，以及胡宗南率大军进驻西安，这便使马鸿逵开始疑神疑鬼，坐卧不安了。

1936年（民国25年，丙子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将二十五师调往西安方面。“西安事变”的结局如何，马鸿逵本人心里拿不准。他生怕押错宝，故对这一重大事件迟迟不予表态。后来，他从新闻报道中得知周恩来和宋美龄分别从延安、南京前往西安进行谈判的情况及新闻界对事变结局的预测，看出蒋介石将要获释并仍掌管大权的迹象。于是，他急速发电向蒋介石大献殷勤，还将发报日期往前挪了几夭。他在电文里宣称，立即释放蒋委员长，要求张学良亲自将委员长护送到南京，为其恢复名誉等等。他想以此来获取蒋介石的好感。

1937年（民国26年，丁丑年），国民党国防部派郑子献为驻阿旗军事专员。随之马鸿逵以阿旗属边陲要地需加强防务为名，派马鸿宾部马赞良团长率一个团初次进驻定远营。那位郑子献专员勾

结定远营城内暗娼李存存，散布“老天爷要火烧定远营”、“唯有上掌饕餮山方顺天意”等蛊惑人心的谣言。其用心是将旗王公和居民骗出城，由他一人独霸城池。阿旗旗府立即追查谣言，经刑讯李存存，查清散布谣言系郑子献主谋所为。随后，将其上告当局驱逐之。自此，郑子献怀恨在心，为伺机报复，便与马鸿逵狼狈为奸，向蒋介石诬告了达理札雅。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全国各族人民中间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揭发汉奸卖国贼的高潮。当时，民众再次揭发了马鸿逵勾结日特的卖国行径。于是，马鸿逵慌了手脚（上一次他将手下的一个司机当替死鬼而搪塞过去了）。这次他又是故伎重演，算计着要找一个大一些的人物作自己的替死鬼，以保脑袋不搬家。为此，他玩弄嫁祸于人的诡计，向蒋介石密告说，达理札雅系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堂妹夫，日本人来阿旗活动，与其有关，此人与政府存有二心等等。蒋介石领悟其用心，密令马鸿逵处置达理札雅，马鸿逵暗自庆幸自己的诡计就要得逞，但又担心事情败露。他先以“有要事相商”为名，企图将达理札雅骗至银川扣留。因达理札雅已有查觉，诱捕未成。后又派一厅长前去行骗，达理札雅仍未上钩。马鸿逵见诱捕不成，遂采取出兵围攻定远营、以武力捉拿达理札雅的强硬手法。1938年（民国27年，戊寅年）的农历正月26日夜间，马鸿逵以重兵突然包围了定远营城。围城兵力除原驻定远营的张海禄团外，又调来宁夏省警备第一旅马宝琳部王有禄步兵团，何玉魁的一个骑兵营和一个炮兵营配合，并派马腾蛟为总指挥。是夜，双方交火激战。当马鸿逵得知阿旗方面的火力大为减弱之后，又玩弄手法，遂即派其老母及马鸿宾等以调解为名前来定远营。他们来后，对达理札雅佯称：“因我方军队换防中产生误会而交上火，实在是对不起。我们两家是友邻地区，都是自家人，不要为此事伤了和气”。同时，要求达理札雅缴出武器，当夜就赶到银川面见马（鸿逵）主席。达理札

雅见重兵压境，兵临城下，只好接受了马家的苛刻要求，于30日缴出步枪700余支，机枪10余挺，大炮数门，只给旗保安队留下20支步枪（当时，达理札雅已将库里的枪支转移他处）。随后，达理札雅及其家眷被押往银川。至此，马鸿逵还不满足，又派两个团袭击驻守巴音陶亥的杨额尔和木（杨富存）的一个中队。杨额尔和木率部奋起抗击马家军，后冲出重围撤至阿旗哈鲁乃山一带，免遭被缴械的厄运。

马鸿逵将达理札雅押到银川后不久，又移送兰州变向软禁了近七年。此间，马鸿逵在阿旗大施淫威，征收名目繁多的捐税，就连酥油也作为征收之列，从而使阿旗不但在政治上残遭压迫，而且在经济上也蒙受了很大损失，财政空虚，入不敷出。据估计，当时马家从阿旗所征收的驼、马多达七千多头。这种厄运，对于一旗之王的达理札雅本人来说，在政治上、精神上蒙受了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而对全旗各界层人士来说，从此以后就被置于马鸿逵的直接控制和奴役之下了。从这一惨痛事件中所得到的历史教训，不能不成为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等日后顺应历史潮流，脱离国民党，拥护共产党，毅然发动和平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2、1926年，冯玉祥在阿旗磴口巴格建兵站的同时，又在该地域强行设置磴口县，派其姓吴的营长出任县长，在银川到磴口之间修筑简易公路，架设了电话线。但是，当时县的职权一时还难以行得通。后来，马鸿逵任宁夏省主席后（1932年以后），就在磴口县大肆安插其亲信，加强了对该县的控制。马鸿逵在磴口县汉民区编制保甲，并强行规定汉民区和蒙民区由县、旗（阿旗）分而治之。磴口地区本属阿旗地盘，而马鸿逵却将磴口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强制推行由县、旗分割管理的规定，制造民族隔阂，加重回、汉农民的经济负担，接二连三地进行征兵。所有这些，势必引起当地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当时，一部分回民因不堪忍受马鸿逵的压榨，由一个姓丁的带头向阿旗政府提出了

归旗的要求。阿旗政府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一千多名回民于1937年得以归旗。对此，马鸿逵极为不满。对于马鸿逵霸占磴口一事，达理札雅曾多次上告国民党当局，但一直未果。因而，他对国民党当局怨气甚大。

1938年，马鸿逵将达理札雅押到兰州软禁后，于1939年元月在阿旗设立了“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该“办事处”与监视定远营马家驻军（一个营）合为一股，成为马鸿逵统治阿旗的一个特权机构。该“办事处”直接掌管定远营近郊的汉民区，并在布固图巴格地域编制十三个保、一百二十个甲，清查户口，征兵、征税，横征暴敛，无恶不作。相继又派温连生、宋清正等，自1942年起在定远营设置“宁夏省军警联合督察处派驻定远营督察分处”，实行粮食封锁政策，严厉稽察粮、盐的进出。他们规定，凡驮盐跑运输者，一把骆驼只准携带一百二十斤粮食，如有超着，一律没收。因此，造成阿旗境内粮食奇缺，老百姓终年不得一饱。

马鸿逵还在阿旗设立“富宁公司”，以贷款、赊欠和行骗等卑鄙手段残酷压榨牧民和中、小商贩。他们趁每年春季牧民生产和生活十分困难季节及一些商贩资金无法周转的机会，放高利贷。而当皮毛上市时，又以他们自行规定的所谓官价低价收购皮毛等畜产品。当时，所谓的官价规定：驼毛每斤二角，羊毛每斤一角，羊皮每张二角，牛皮每张四元。“富宁公司”通过放高利贷和所谓官价等手段，垄断皮毛市场进行盘剥，致使全旗原有的一百五十来家大小商号到解放时只剩下资本稍雄厚的几家了。此外，在居民中先后征兵七次，约征了六百余名。征兵时，实行以马（或驼）代丁的办法，大肆向居民勒索钱财，曾经出现过五匹马（或七峰驼）代替一个兵丁的事。

由于马鸿逵通过其驻定远营“办事处”等机构，对阿旗进行肆无忌惮的剥削和掠夺，致使阿旗地方同“办事处”的对立日趋

激化，甚至达到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地步。如1942年，宁夏“办事处”向定远营商会威逼索取数额颇多的军用摊派款项时，当即遭到商会会长杜友民等人的抗议拒绝。“办事处”恼羞成怒，将杜会长逮捕关押。阿旗旗府对此愤愤不平，马上向“办事处”提出质问，并将此事报告了马鸿逵本人。随后，罗巴图孟柯、陈爱尔德尼巴图（陈宝峰）等当夜召集紧急会议，断然作出了向马鸿逵开战的决定，由罗额尔和木巴图起草了措辞强硬的紧急通知。通知要求：旗属各巴格、防卡和寺院，接此通知后，青壮年不分僧俗，立即武装起来，作好打仗的一切准备，就地集结待命。当旗府正要派专人赴各地传达紧急通知时，宁夏“办事处”见势不妙，急急忙忙释放商会会长，赔礼道歉。罗巴图孟柯等见“办事处”服了软，为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随即也就放弃了开仗打算。在当时，只拥有三万多人的阿旗竟作出向马家十万大军开战的决定，这真是人们难以置信的奇迹。它体现了阿旗各界人士在残暴的民族压迫面前，“宁以战死，也决不跪着求生”的坚强意志。

3、国民党当局对阿旗存有戒心，由来已久。在他们看来，以蒙古族为主的阿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必须列为特殊地区，严加防范。当首任军事专员郑子献被轰走后，国民党国防部于1939年又派李自财来阿旗充任专员，设置了驻定远营专员办事处。至1949年，该专员办事处的专员易人六次，副专员易人五次（末任专员是罗大焯）。1939年，为防范蒙古人民共和国，专员办事处在北部沿边境一线的沙堤阿门（班迪德陶鲁盖防卡）、沙尔扎庙各设一个电台。此外，马鸿逵在巴音毛道也设有一个电台进行监视。

1940年，活动于沙堤阿门的电台被蒙方端掉。鉴于此，专员办事处将边境地区的防务，仍交阿旗地方负责。旗府无奈，只好在班迪德陶鲁盖、雅干、脑干敖日布格、呼和陶鲁盖、塔本阿拉达等沿边地区设置五个防卡，派绰特宝充任防卡队长。后于1944年另派段塔勒腾岱、巴德玛吉尔格勒任防卡队长，以防范蒙古人民

共和国。段塔勒腾岱到任后，暗中与蒙方人员来往，向蒙方提供了国民党方面的情况。1945年秋，段塔勒腾岱将持有蒙古人民共和国公文的蒙方信使巴图带回定远营。蒙方信使在达理札雅的住所与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进行了两次秘密会晤，双方交换对时局的想法后，达理札雅表示，希望双方经常保持联系，对于蒙方的有关要求，阿旗方面尽量予以满足。随后叫段巴特尔、陈那筭巴图、毛宝音敖其尔三人起草旗府的回信，将信件及回赠蒙方的礼物哈达、地毯等交与蒙方信使（巴图来时备有哈达、衣料等礼物），又令段塔勒腾岱将巴图护送出境。再则，1946年秋，段塔勒腾岱曾将蒙方的巴图吉尔嘎拉带回定远营，安排其与罗巴图孟柯等见面。

在当时，旗扎萨克达理札雅若想给段塔勒腾岱定罪、逮捕巴图等蒙方人员，那是易如翻掌的事。可是，达理札雅等并没有那样做，而是把蒙方代表以宾客相待，愿双方常来常往。这显然表明达理札雅等对共产党并无恶感，流露了达理札雅对人民革命事业的同情心。这一点，也是他们这些人发动和平起义的思想基础之一。

4、1932年（壬申年），达理札雅在其二十八岁袭任旗扎萨克职后，就将其前任扎萨克塔旺布鲁扎勒所器重的副协理罗巴音都古楞、管旗章京白和尚、图布吉尔格勒、副章京尼木德敦子尔、俞耶生达来等老臣，先后准长假将其辞职还乡，随即起用一批新人作为自己的左右臂膀。他分别委任罗恩克巴图为协理，罗巴图孟柯为副协理（后就任协理），陈爱尔德尼巴图为管旗章京，段巴特尔为副章京。临解放前几年，又相继提升罗朝克图格日勒（罗瑞光）、罗布音特古勒德尔（罗永寿）二人为协理銜台吉，陈那筭巴图、白图布巴雅尔为副章京，胡乌力吉巴雅尔、毛宝音敖其尔、左甲木英敖迪布、金巴图道尔吉、齐图门巴雅尔、李斯琴毕力格等为旗府各处（局）长官。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动乱时局当中，以